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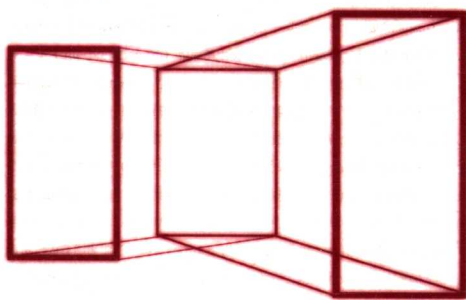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政治哲学导论

[英] 杰弗里·托马斯 (Geoffrey Thomas) 著

顾肃 刘雪梅 译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导论/[英]托马斯著;顾肃,刘雪梅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ISBN 7-300-07036-1

I. 政…

II. ①托…②顾…③刘…

III. 政治哲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835 号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政治哲学导论

[英]杰弗里·托马斯(Geoffrey Thomas) 著

顾肃 刘雪梅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0.75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4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了这套“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是怎么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等等，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

从词源上说，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惯的周而复始，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某种反感甚至是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智慧的撞击以及由此撞击出的智慧火花。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具体来说，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包括以下做法：

第一，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

例如，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并且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如果有，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去认识它？其途径、过程、程序、方法、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否达到真理？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和途径是什么？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语言、思想与实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心灵与我的肉体是什么关系？除我自己的心灵外，还存在他人的心灵吗？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不存在？在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世界吗？死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没有上帝？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一切都被必然性决定，

还是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人可以自由选择、连带地也要负道德责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正义、自由？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有哪些根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如何区分和鉴别美与丑？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每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提出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形成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美学等众多的哲学分支学科。

第二，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或不可接受”（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唯一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哲学应该展现先哲们对上面那些问题的各种主要回答，并详细重构他们对这些回答所给出的各种哲学论证及其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者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感受、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2002—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听过一门宗教哲学课程，它是这样上的：教授预先布置与课程有关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课下完成阅读，教授则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每次

课两小时，只重点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证。教授先陈述这个论证，并做必要的诠释和引申，然后学生举手发言，提出支持或者反驳这个论证的种种理由，其他学生再对此进行辩驳，教授则不时插话，或补充信息，或参与对话，以此引导、控制着整个讨论进程。下一次课教授则陈述一个与前次课刚好相反的哲学论证，学生再就其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自然不是被引向论证的结论，而是被引向论证的过程、方法或程序；并且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对同一个问题给他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解答，并且向他说明每一种解答都有支持或反驳它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是完全充分的，要求他本人通过创造性思考，对这些论证再作出重构、评价、支持或者反驳。我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值得借鉴，因为它使学生与哲学史上的大师们一起思考，并有可能促使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洞见。

第三，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

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或展开。黑格尔说，不应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错误的陈列馆”，而应该看作是“神的形象的万神庙”。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描述，它既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包含着绝对的东西，永远有它的价值。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大师们的原典和著述，学生们与他们一道思考，也就学习了应该如何去做哲学的工作，其方法和规矩是什么。因此，西方哲学教学特别注重原典和大师，每一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选本，通常篇幅不小，里面是节选的哲学大师的原创性论著，供学生课下阅读。在构思本系列时，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来规划的，每一门哲学课程都有一本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读本，由此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原典，引向大师。但由于在联系版权时，在每一个读本中都会有当代哲学文献，这需要分别与其中每一篇文献的原作者联系版权，过于麻烦，我们就放弃了这一设想。但是，哲学教学要把工夫放在大师和原典上，这一点却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优秀者是少见的，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文本，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必要的尊敬与敬畏，并且它们也是我们获得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

第四，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我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它对一切问题都要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与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也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一点叫做哲学思维的敞开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卡尔·波普尔把这种哲学活动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和恰如其分：“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①

第五，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

如果说，哲学史是仍然活着的哲学，那么，当代哲学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它既是以往哲学的延伸，更是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反省与回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强烈的现实感。因此，在哲学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当代哲学家的工作，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他们的讨论，或者评价他们之间的论战，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哲学智慧。

要言之，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教学也应该能够培养、锻炼、激发出学生的智慧。

陈 波

2005年5月5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① [英] 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等译，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献给

加罗·艾维金 (Garo Avakian)
彼得·戴维森 (Peter Davidson) 和
帕特里克·亨默 (Patrick Hemmer)

纪念

阿列克谢·尼柯拉耶维奇 (Alexei Nikolayevich)

序 言

xi 我首先要感谢我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学生们，自1984年以来，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许多专题。

其中三名学生——Jim Batty, Jan Brown 和 Stephen Mather，读过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我感谢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Garo Avakian 特别值得一提，在我1997年2月至4月的“现代国家的兴起”的系列讲演中，他能够提出一些出人意料和完全让人着迷的问题。他提醒我说，亚美尼亚哲学仍然活着，活得很好，他还清楚地把它表达了出来。在同一系列讲演中，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dson）提出了以恰当方法对待经典文本的深刻问题。

我在本书第一章对乌托邦政治思想的讨论大大得益于跟帕特里克·亨默（Patrick Hemmer）的讨论。他对自然科学中库恩的“范式转换”与乌托邦政治预言之间所作的类比是猜测性的，但很有趣，对此本书中虽未作探讨，但此举表现了真正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学生的印记。

值得为我的朋友 Colin Donne 专门写一段。当本书大量内容因学院性能不稳的电脑而可能难以得到安全操作时，他主动出借他自己的电脑，使本书文本在其电脑上得以完成。我对他这种慷慨相助而毫无索取回报之意，表示发自内心的谢忱。我还要感谢他制作了本书所有的图表。

先是学生然后成为朋友的 Scott David 也值得一书。与他清晰透彻、无所畏惧的哲学头脑分享理念，的确饶有趣味。他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反思的平衡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占据何种地位？》，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作品。

在一代学生中，像 George Walker 如此优秀的人可能仅出现一两次。他“偶尔”客串政治哲学，对此领域仅有边际的兴趣，但在通向最终兴趣领域的路上，他清楚地阐述了所讨论的每一个论题。我为曾经教过他并且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而感到荣幸。

我1996—1997年的助教 Adam Tebble，在我滞留于观念前期时，他经常摇撼我的思想。“好了，哈耶克说”——这种热情洋溢的声音经常是耳畔令人高兴的鼓励。

我常与三位朋友讨论问题，他们是：Gabriel Apata, Don Pincham 和 David Rodway。这些年来与他们的对话在我的政治思维中仍然记忆犹新。

我要感谢以 Jo Wolff 为主席的伦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组。该组非正式讨论会上的生动而富有学识的交流常常是灵感之源。这里要感谢 Jo Wolff, Alan Carter, John Charvet, Andrew Chitty, Sebastian Gardner, David Lloyd Thomas 和 Michael Saward。并且特别感谢 1988 年介绍我加入该组的 Roger Scruton。

这里我还乐于表示更一般、更久远的谢意。我作为学生的时代早已结束，但仍要忆起第一次接触政治哲学的情形。那时，已故的贝内米 (F. W. G. Benemy) 先生，伦敦威廉·艾利斯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向他的六年级学生介绍了霍布斯、洛克以及那被困惑地称为“自然状态”的东西。我还忆起“班大叔”谴责柏拉图是民主的敌人。更深的记忆是对已故的奥拉姆 (H. J. C. Oram) 先生，他教给了我迄今所知的大部分经济史知识。奥拉姆的规则：“把它拉下来，再放回去”（“不管汤因比会怎么说，工业革命不是始于 1760 年；它的前身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1760 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戏剧性的事，这一年是完全平常的一年”）。这一规则对我的经济学和我所知的任何领域都是很好的指导。他的专业教诲丰富了我对经济学与政治学关系的全部理解。

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幸事，是我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伦敦经济学院读本科时受教于已故的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教授。他给我的益处不只是在过去，现在仍在不断更新。他是一名“大师”：每次翻开他的书，我都在向他求教。我还要感谢七位富有才华的老师：Maurice Cranston 教授、Morris Ginsberg 教授（“Ginsberg 教授，你对社会主义和财产权能够推荐什么呢？”他疲劳的老花眼看着我，也许想到我深深的无知，然后温和地说：“有关社会主义，就是这些了”）、John Morrall 博士、David Nicholls 博士（“我读的阿奎那不是这样的，当然你要是这样说的话……”）、Robert Orr 博士（“政治理论都是时髦货，长不了。最终一切都没了”）、Leslie Wolf-Phillips 博士、K. B. Smellie 教授（“不要在拉斯基上浪费时间，你可以省些时间读柏拉图”；“你先把什么作为你的特别文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论自由》 [on liberty]？很好，我要你放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嗯，托马斯先生，我要你读鲍桑葵 [Bosanquet, 1848—1923] 《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 [Philo

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的第一章，但你不必再往下读了——否则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自然，越是禁止，我读得越多，其结果就是现在这本书。让读者来决定这是不是灾难性的)。Cranston, Ginsberg, Nicholls 和 Smellie 都已经作古，但上述所有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我研究政治哲学的路径上打下了持久的烙印。我的一名学生 David Thurston 也值得一提。他对 19 世纪欧洲大陆思想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在政治智慧方面的细致敏锐，构成了我们所有谈话的美妙配乐。

John Morrall 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手稿。他的那些评论澄清了他所接触的每一个论题。他经过数天的细读，所花的时间和这部草稿本身激发他写出了一长篇研究论文，该论文富有学识、明白易懂并恰到好处，把我半生不熟的东西转变到可以理解的合理水平。

还有要感谢的。我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牛津大学受普拉梅那兹 (John Plamenatz) 教授的指导。我已经开始看到他研究成果的价值和独特之处，但我感到后悔，自己没有超越某些表面的障碍（主要是他倾向于不直接引用而是阐述），这使我未能领略他下苦功细致入微地、真正敏锐地阅读“伟大的已故哲学家”的著作的意义。

我与他的这种失败的关系也带来了好事：因为我很快找到了一位非正式导师。哲学在我身上施加其魅力。哲学上博学的奇才，牛津耶稣学院的理斯 (David Rees) 博士，向我打开了哲学的心脏地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智和语言哲学。他深刻而精巧的学术研究代表了牛津的长期传统——史密斯 (J. A. Smith)、乔基姆 (Harold Joachim)、韦布 (C. C. J. Webb) 和罗斯 (Sir David Ross) 的传统。理斯抗议说：“我不能跟你所说的这些学者相比，我请你降低引用我的调门。”可是重要的是，理斯教导我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记得很清楚，他经常挑衅性地问：“你怎么想？”

xiii 伯克贝克学院哲学系是缩微的柏拉图学园。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想：“斯各特 (Scott) 对这一点会说什么呢？”“多罗西 (Dorothy) 对此会怎样表示反对呢？”我还会小心翼翼地猜测，这样那样的提法会不会引起 David Wiggins 亲切的批驳（“啊，事情并不就是这样的”）。这里要感谢的是：John Dupré 教授、Dorothy Edgington 教授、Miranda Fricker 博士、Anthony Grayling 博士、Sebastian Gardner 博士、Samuel Guttenplan 博士、Jennifer Hornsby 教授、Christopher Janaway 博士、Sarah

Patterson 博士、Anthony Price、Barry Smith 博士、Scott Sturgeon 博士和 David Wiggins 教授。

最后，感谢通读了全部文本并以各种方式在每一阶段都提供帮助的 Leslie Marsh。

杰弗里·托马斯

1999 年 4 月 13 日于高门 (Highgate)

缩略语及注释体例说明

ASU = Nozick, R.,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74.

CG = St Augustine, *Of the City of God [De Civitate Dei]*, tr. H. Betten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Original text: 413—426 AD.

DI = Rousseau, J.-J.,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 tr. V.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Discourse*: 1755.

F = Hamilton, A., Madison, J., & Jay, J., *The Federalist*, ed. M. Beloff, Oxford: Blackwell, 1948. Original text: 1777—1778.

FT = Locke, J., *First Treatise of Government [The False Principles and Foundation of Sir Robert Filmer... Detected and Overthrown]*, in P. Laslett, 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Original text: published 1690, mainly written 1680—1681.

L = Hobbes, T., *Leviathan*, ed. R.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Original text: 1651.

NE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 Sir David Ro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Original text: circa 330 BC.

OL = Mill, J. S., *On Liberty*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ed. S. Colli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Original text: 1859.

P = Aristotle, *Politics*, tr. J. Barnes, ed. S. Ev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Original text: circa 325 BC.

PCE = Machiavelli, N., *The Prince*, tr. & ed. P. Bondanella & M. Musa,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Original text: 1513.
- PKM=*The Portable Karl Marx*, ed. E. Kamenka, Harmondsworth; Penguin, Original texts: 1841—1882.
- PPS 1=*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1st Series, ed. P. Laslett, Oxford: Blackwell, 1956.
- PPS 2=*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2nd Series, ed. P. Laslett & W. G. Runciman, Oxford: Blackwell, 1962.
- PPS 3=*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3rd Series, ed. P. Laslett & W. G. Runciman, Oxford: Blackwell, 1967.
- PPS 4=*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4th Series, ed. P. Laslett, W. G. Runciman & Q. Skinner, Oxford: Blackwell, 1972.
- PPS 5=*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5th Series, ed. P. Laslett & J. Fishkin, Oxford: Blackwell, 1979.
- PR=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 W. Wood, tr.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Original text: 1821.
- R=Plato, *The Republic*, tr. H. D. P. Lee,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Original text: circa 375 BC.
- SC=Rousseau, J.-J.,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 tr. V.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Original text of 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 SL=Mill, J. S.,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London: Longmans, 1970.
- SPL=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 A. M. Cohl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Original text: 1748.
- ST=Locke, J.,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in P. Laslett, 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Original text: published 1690, mainly written 1681—1682.

TJ=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一般引文体例是在正文中标注, 注明作者或编者, 其著作以数字标明章、节或卷, 然后是所引版本、页码。例如: ST § 27: 287, 指的是 Locke's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Laslett's Cambridge edition, paragraph 27, page 287。又如 P III, 8: 62, 指的是 Aristotle's *Politics*, Book III, ch. 8, Barnes's translation, page 62。有时候对 Aristotle 和 Plato 的著作也引用其所有版本和译本通用的行数: 例如, “R I 352D” 和 “P II. 81269a20”。参考书目体例为: 作者名, 出版年代, 页码。例如, Lawrence, 1989: 49, 指的是 P. K. Lawrence, *Democracy and the Liberal State*,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page 49。

对于历史文献, 必须决定引用体例。我遵循了现在通用的标注所引版本年代的方法 (也许有点问题)。例如, Hume, 1978 指的是 David Hume's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 H. Nidditch 的版本, 尽管 Hume 是在 18 世纪写作此书的。对所有此类情况, 我把最初版本的年代标注于“参考文献”之中。

目 录

序言	(1)
缩略语及注释体例说明	(5)
第一章 导言	(1)
1 关于本书	(3)
2 政治哲学的领域	(3)
2.1 政治的性质	(4)
2.2 目的论的观点	(5)
2.3 预设前提的观点	(7)
2.4 作为论坛、过程的政治	(10)
2.5 政治五因素模型	(10)
2.6 政治自主	(14)
2.6.1 观念自主	(14)
2.6.2 因果自主	(15)
2.6.3 价值论上的自主	(16)
3 政治哲学的政治观	(17)
3.1 研究政治的方法	(17)
3.2 历史、政治科学和哲学	(17)
3.3 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	(18)
3.4 哲学的特性	(18)
3.5 作为概念分析的哲学	(20)
3.5.1 概念的性质	(20)
3.5.2 分析的本质	(21)
3.5.3 哲学对概念的关注	(21)
3.5.4 分析的变体：关联的、功能的和辩证的	(22)
3.6 作为高层次理论化的哲学	(23)
3.6.1 古典的理论化	(25)
3.6.2 二级理论化	(25)

3.6.3 非自主的理论化	(25)
3.7 作为悖谬研究的哲学	(26)
3.8 哲学的各个分支	(27)
3.9 哲学诸流派	(28)
4 概念分析：恰当性检验	(29)
4.1 概念在逻辑上的多样性	(30)
4.1.1 封闭的概念	(30)
4.1.2 本质主义的概念	(30)
4.1.3 家族相似的概念	(31)
4.1.4 实质上争议的概念	(32)
4.2 第一种检验：逻辑上的独立性	(33)
4.3 第二种检验：外延与内涵的恰当性	(33)
4.4 第三种检验：功能性	(34)
5 高层次理论：恰当性检验	(35)
5.1 道德理论	(37)
5.2 真理	(38)
5.3 合理性	(39)
5.4 商谈理论	(40)
5.5 反思的平衡	(40)
6 悖谬：对答案的检验	(43)
7 政治哲学的结构	(43)
7.1 政治概念分析	(43)
7.1.1 政治概念的历史多样性	(45)
7.2 高层次理论化	(47)
7.3 对悖谬的研究	(47)
7.4 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哲学	(47)
7.5 政治哲学与观念的历史	(50)
7.6 作为研究和活动的政治哲学	(51)
8 政治哲学的价值	(52)
8.1 政治哲学的实际应用	(53)
8.2 陌生的与熟知的	(55)
8.3 乌有之乡事物之意义	(56)

8.4	政治的词汇	(56)
8.5	政治哲学与个人实践	(57)
9	通向政治哲学之路	(58)
9.1	分析的方法	(58)
9.2	经典文本(“鸿篇巨著”)的方法	(58)
9.2.1	理性重建	(65)
9.2.2	历史重建	(65)
9.2.3	解构	(66)
9.3	问题意识的方法	(69)
10	本书计划	(71)
第二章	权力、权威、主权、法律与国家	(75)
11	前言	(77)
12	权力	(77)
12.1	基本区别	(78)
12.2	常见的权力理论	(80)
12.3	权力分立	(82)
13	权威	(86)
13.1	基本区别	(86)
13.2	政治权威的基础	(89)
13.3	政治权威的基础: 神权、知识及同意说	(90)
13.3.1	神权	(91)
13.3.2	知识	(93)
13.3.3	同意	(97)
13.4	权威、合法性和义务	(105)
14	国家与主权	(106)
14.1	基本区别	(106)
14.2	有关国家的理论	(108)
14.3	国家与政治	(109)
14.4	国家与社会	(110)
14.5	国家与城邦	(112)
14.6	主权	(114)
14.6.1	主权与国家: 对合法权威的批判	(117)